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

龙 野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 艾南英因时文房选与江左文人发生争论,成为晚明文坛的一段公案。因张溥等的离间策略,艾氏与张自烈就编选时文展开争辩,并认为张自烈的《国朝今文辩》大量抄袭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有证据表明,张自烈编选时文之举受到了江左文人的唆使,论争实际是艾南英与江左文人矛盾的延续。艾南英强调以江右古文传统改造时文,而张自烈编选时文"重经",与江左重秦汉的文学主张接近。二人论争是地域文学传统之争在时文领域的反映。

关键词: 艾南英;张自烈;时文;地域文学传统;晚明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3-0052-05

The Quarrel between AI Nanying and ZHANG Zilie over the Essays Prescribed for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ONG Y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quarrel between AI Nanying and scholars from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became a well-known cas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wedge set by ZHANG Fu and others caused AI Nanying to argue fiercely with ZHANG Zilie. AI thought that *Guo Chao Jin Wen Bian* compiled by ZHANG copied much of *Jin Wen Ding* and *Jin Wen Dai* compiled by AI.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ZHANG Zilie was instigated by scholars from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to select and compile the essays prescribed for civil examinations. The argument was actually the continuation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AI Nanying and scholars from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I Nanying emphasized to reform the selection of essays prescribed for civil examinations according to the Jiangxi's traditional ancient style prose, while ZHANG Zilie emphasized classic proses in his selecting and compiling, which was close to the literary view of scholars from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who emphasized the Qin-Han literature. The quarrel between AI Nanying and ZHANG Zilie reflects argument over the regional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essays prescribed for civil examinations.
Key words: AI Nanying; ZHANG Zilie; essays prescribed for civil examinations; regional literature traditio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号天傭子,江西临川人,著名的时文选家,与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结"豫章社",一度操持晚明时文选政。他坚持江右古文传统,认为"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采

收稿日期: 2013-01-23
作者简介: 龙 野(1982-),男,湖南永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献与文学批评。

用“以古文为时文”(《金正希稿序》)的策略匡正时文风气。他因选文与多人发生争论,尤以与陈子龙、周钟等江左文人的论争广受关注。[1] 因复社领袖“以豫章攻豫章”的策略,艾氏与部分江右文人发生论争,张自烈就是其一。有学者对此作过简略介绍,将其视为学术异同之争,[2] 实则二人之争是艾氏与江左文人论争的延续,也是地域文学传统之争在时文领域的反映。

一、论争的经过与焦点

晚明科举出版业兴盛,时文房选的刊刻与文人结社、出版市场等因素联系到一起,争夺异常激烈。艾南英与张自烈就时文展开的论争,是晚明时文房选的重要事件,根据现存资料,我们大致可以考证其经过。

张自烈(1597 – 1673),字尔公,号芑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江西宜春人。早年入复社,长期旅居金陵。著有《四书大全辩》、《古今文辩》、《芑山诗文集》、《正字通》等。从崇祯年间起,张氏在金陵参与选文活动,与张溥、周钟、艾南英、杨廷枢、刘城、张明弼等人并称。张氏选文从一开始就针对艾南英刚在苏州出版的《今文定》、《今文待》而来。约崇祯六年(1633),张氏编选了《国朝今文辩》(以下简称《今文辩》),将诸家房选重新删评而成,大部分内容与《今文定》、《今文待》所选文章重合,由金陵书坊石啸居出版。艾氏得知张氏出版《今文辩》一书后,认为这是对自己所选《今文定》、《今文待》的翻版,故致书复社人士吴应箕、沈寿民,请二人代为搜求张自烈选本,并写信责问张氏。见张氏无回应(据张氏后来说,未收到信),他又致信张瑀(号慎轩,临川人),指责张自烈此举有“五不可”,希望阻止此书发售。艾氏指出其书虽取名《今文辩》,实际上却是翻刻自己的书,损害到了苏州书商的利益,认为张自烈不该让金陵书坊干损人利己的事。同时指出海内珍视《今文定》、《今文待》二书是因为自己收罗很广,而张自烈仅仅从八股文间因人成事,所选时文除时流社稿外,大量抄袭《今文定》、《今文待》,且评语错误极多。最重要的是,艾氏指出张自烈此举是“以同乡之人,为无益之诤,意必中吴诸兄憎弟,托尔公以豫章攻豫章”,[3](《与吴次尾书》,P134) 怀疑张氏是受江左人士指使而对自己发难。张自烈对艾氏的指责予以回击,论争就此展开。

论争引起了吴应箕、陈弘绪、刘城、邓履右等人的关注,诸人均有书信调解,张氏也在致友人的信中展开自我辩护。他在给吴应箕的信中,对艾南英的“五不可”一一作了辩驳,“先是周介生《国表》一选,四方奔命恐后,弟贱名拙作,未尝借齿牙其间。乙丑,弟途次作长书投金沙,语甚切直,冀介生覃精古业,勿丹黄时文,时尚未识介生也。去秋,以闱事聚首金陵,因与受先、简臣、我容诸子谋面。辛未,弟入都门,士业诒书介弟见张天如、吴骏公,不数语而别。……岂弟复为中吴指使耶?”[4](《与吴次尾书》,P134) 详列与江左人士交游始末,强调自己与周钟等并无密切交往,对艾氏所指责他是受吴中人士指使予以否认,并继续刊刻《今文辩》。艾氏对此很不满,于崇祯八年的《甲戌房选凡例》中列张氏“大罪三,丧尽良心者一”,[5](《杂记四》,P276) 予以抨击。① 对此张氏有《甲戌文辩》予以回击。张氏还打算作《辩艾书》反击,吴应箕、刘城等则写信劝阻。

吴应箕指出,张自烈《甲戌文辩》对多人评语均有驳正,可见先前的《今文辩》不专门为艾南英而发。认为艾氏《凡例》中列张氏“三大罪”的做法过于冲动、亢直,不为人设身考虑,有失风度。他希望张氏不要出版《辩艾书》,“故弟愿兄《辩艾》之书亦自今已矣,万一必不可止,仍当从文字起见,而诋诃嫚骂之语,切宜戒之”。[6](《与张尔公书》,《遗文》卷一,P10) 同时,吴氏寄信给艾氏,进行调解。尤其引艾氏与周钟之矛盾为鉴,“从来是非久则自定,又何必亟亟求伸于尔公也。……向因兄过责介生,人心始有异同”,[7](《与艾千子书》,《遗文》卷一,P8) 建议艾氏评文应宽厚待人,并告知已劝阻张氏刊刻《辩艾书》,希望二人停止辩难。刘城、陈弘绪也写信劝阻张氏,出发点大致与吴应箕相似。刘氏举朱熹与陆九渊,李梦阳与何景明辩难之例,建议张氏主动停止与艾氏的论争。“远之朱、陆异同,近之李、何推驳,一再往复,亦遂罢矣。尔公已辩矣,千子已答辩矣,弟愿两家斩然遂止,然请从尔公始。”[8](卷六《答张尔公书》,P464) 陈氏信今不存,张氏回信否认受人指使,并强调“弟今日驳《定》、《待》谓之以豫章攻豫章,乡(向)日千子摘大力、大士,不谓以临汝攻临汝乎?”[9](《与陈士业书》,P140) 拿艾氏刊刻《四家合作指谬》作比,证明自己并无攻击艾氏之

① 艾南英批判张自烈“三大罪”为:叛朱注,毁先辈,滥收社房文稿。见《杂记》十七转引。

意,反指是艾氏门户意识强烈,不忘旧怨。

同时,针对艾南英攻击自己"丧尽天良"一语,张自烈在致艾氏的信中详列艾氏的不佳品行。有"家居峻城府,好夸曼"、"较阅房书,一月买两妾"、"举人而僭御史服物"。[6](《与艾千子书》,P141-144) 指其排击社友、爱惜钱财、贪利忘义等,对艾氏极尽挖苦之能事。艾南英也对张氏多有批评"自予选《今文定》、《今文待》后,诸刻因稍加异同,往往如是。又有明袭予之议论而又以师人为耻,欲故自二如吾乡之某某者,此其心又出前人下矣。"[6](卷八《十科房选序》,P299) 就明显指向张氏出版《今文辩》之举。

后来,张氏还刊刻过《辩艾略》。艾南英在崇祯十二年(1639)刊刻《增补今文定》、《增补今文待》,张氏则有《增删今文辩定本》,批驳艾选。他还不忘艾氏崇祯十五年刊刻的《历科墨选》选周钟之文的错误,[5](《与吴次尾》,P167) 并于此年刊刻《壬午程墨文辩》。可见从崇祯六年起,直到崇祯十五年,张自烈还在就选文攻击艾氏,持续时间较长。基本是艾南英出一选,张氏就会跟着辩驳。张自烈因与复社关系密切,故在论争中获得较多支持,张氏的《四书大全辩》等也因复社人士支持而被官方认可刊行。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尽管论争中双方并未说服对方,但结果却出现了复社选文独盛的局面。

实际上,我们重新审视此次论争,会发现其焦点主要在于改造时文的取向上,而双方学术理念及所受地域文学传统影响的差异则是导致取向不同的原因。张自烈尽管生于江右,但长期生活在金陵,与江左文人交往密切,受江左文风影响很大。学术上偏于汉学,注重由字义出发阐发"理",对宋明理学有所批评,如《四书大全辩》、《四书三家合辩》(批驳《大全》、《蒙引》、《存疑》三书)等就是如此;而艾南英在学术上笃信宋学(程朱理学),坚守江右理学传统。他曾说"其最陋者,厌薄成祖文皇帝所表章钦定之《大全》,而骄语汉疏以为古,遂欲驾马、郑、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汉儒于道,十未窥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余,其好名而无实亦可见矣。"[6](《今文待序中》,P293—294) 就是守程朱,反对用汉儒训诂入时文。二人的取径有着明显的分歧。这种理念的差别,使得双方在匡正时文时取径有别。受王学的影响,晚明时文领域子书盛行、文风奇诞,"士子谈经义辄厌薄程朱,为时文辄诋訾先正"。[6](《增补今文定今文待序》,P295) 江左文人提出以经学来改造时文,但多流于貌袭,生割字句。艾氏曾多次批评张溥、周钟等尊经是伪经学,是赘经语以就题,是剽窃。且对江左人士以六朝骈偶纤弱之风入时文表示不满。他注重维护《四书大全》、《四书蒙引》等书的权威,坚持用江右古文传统改造时文,主张由唐宋古文气脉探索时文脉理,强调文章要平淡,实际是古文家的时文理论。而张自烈文学主张接近秦汉派,尤其注重经学对改造时文的重要性。他对艾氏主张提出批评,"乃又有僩然出所学以救救敝之敝者,义则影附于程朱,体则规摹于欧曾,导之以《大全》、《蒙引》、《存疑》之讲说,绳之以洪、永、成、宏、嘉、隆先正之尺度,一时学者皆响应,朝夕诵服恐后。究观其书,往往以坚瘦枯寂者为朴澹,以空转纡行者为浑古。复专取似程朱者而谓之程朱,似欧曾者而谓之欧曾,非不尽去其□蹐獝狂赘疣之习,而制义卒流于委靡不复振,岂克有济哉"。[7](卷十一《四书大题文辩合删序》) 艾氏提倡以程、朱之义与欧、曾古文之法入时文,绳之以洪、永、成、弘、嘉、隆先正之尺度,以改造万历以来败坏的时文风气。张氏批评艾氏提倡以欧、曾古文法入时文,也是貌袭欧曾、程朱,也是"似"。艾氏曾指责江左人士是貌袭前、后七子,张氏的反驳可谓针锋相对。

综上,艾氏强调维护程朱权威,反对王学空疏之风入时文,主张用欧阳修等古文平淡之法去改造时文,而张氏重汉学,主张用经学改造时文;艾氏主张时文复古,强调"先正之尺度",反对求奇,而张氏主张时文复古的同时适应时变;艾氏主张由唐宋古文气脉探索时文脉理,进而上溯秦汉,而张氏主张直接取法先秦文法,差别较大。江左人士的唆使,则是论争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艾、张之争的实质及影响

明天启间,"豫章社"选时文曾笼罩海内,形成"天下文章皆推豫章"的局面。但是随着江左文社兴起,特别是周钟得到张溥的支持选文,情况有所改变。逐步出现豫章、金沙、莱阳等共同选文的局面。艾南英因此主动联系周钟等,主张以唐宋之法改造时文,但未获认同。崇祯元年(1628)冬,针对张溥《表经》,艾氏有《戊辰房选千剑集序》予以诋讥。第二年春,艾氏又刊刻《戊辰房选删定》,引起江左文人的极度不满。张溥、周钟联合张采、宋玫等对艾氏采取孤立措施,并利用艾氏刊刻《四家合作指谬》的机会离间其与另外三家的关系。"阅艾千子房选,显肆攻击,大可骇异,吾辈何负于豫章,而竟为反戈之举?

……可与大士、大力、文止讲明，弟与介生止恃兄在临川，豫章之交自固，不患一人之跳梁生事也，惟早图之。”[8]（卷一，P483）这导致了艾氏与陈际泰、章世纯两家产生矛盾，使二人背离艾氏而靠近复社。崇祯四年（1631），艾氏编选好《今文定》、《今文待》，并在给杨以任的信中提道：“《房删》者，弟之大黄，《文定》、《文待》，弟之参芪也。何人能阨而止之？”[9]（卷三《答杨澹云书》，P224）对江左文人的排斥与打压予以反击。崇祯六年（1633），艾氏正式出版二书，攻击张溥、周钟等人的时文房选。这彻底激怒了江左文人。他们拟批驳艾氏的《今文定》、《今文待》，就如同艾氏《戊辰房选删定》删改《表经》一样，只不过他们没有亲自出面，而是物色江西之人攻击艾氏，张自烈就是其一。艾氏与张氏的时文房选之争，实际上是他与江左文人争论的延续。

艾南英曾说“二十年来，举业选政竟趋吴中，而一时空疏不学、结党横议如张自烈、吴应箕之徒，为之爪牙，张吻向予，予僛然忧之”，[6]（卷九《重乐轩初选序》，P311）指出张溥、周钟等选文是用编选时文结党，认为张自烈受到江左人士的唆使攻击自己。尽管张氏本人不承认，目前也无直接材料证明张氏受到唆使，但当时除艾南英外，还有人认为张氏受到唆使。在二十卷本《天傭子全集》卷首，附有张符骧书信《与薛方平》提到了曾畹、周圻、周亮工对艾、张之争的看法。

当时如周百安、周栎园诸君子皆言尔公为中吴指使，以豫章攻豫章。周百安曰：“东乡与云间以文事相龃龉，谋攻东乡者欲以其乡之人攻之，谋之曾庭闻，曾怒拒之。遂及某，某即出而与东乡辩。无论东乡学业有本，非某所能訾议，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之戈，其心术已不可问，又何足与之谋千秋大业哉？此不可不慎绝其人也。”周栎园曰：“当时同人极服庭闻之不阿附以成名，然庭闻不应，后遂有张某出而应之，同一乡人也，人品之悬殊若此。”[6]（卷首《与薛方平》，P185）

信中所提及之“庭闻”即是曾畹，曾畹（1621－1677）原名传灯，字庭闻，江西宁都人。曾入复社，江左文人曾唆使他攻击艾南英，遭到他的拒绝。在艾、张之争中，他比较同情艾氏的遭遇。他提及吴中人士“以豫章攻豫章”出自《答李屺瞻书》：‘畹束发从先大人游于吴，与天如、受先、维斗诸先生，先后抗行。其时，金沙诸子谓艾东乡不近人情，欲得豫章之乡之人而攻豫章，谓此事非曾子不可，举而谋之于畹。畹顿首谢曰：‘千子即可攻，非畹之可攻也。小子畹与千子，有同里之谊，其近情与不近情，虽畹不获深知，然观其于程朱训诂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门户有禁，立社有禁，畹初纳交天下士，诸先生无我谋也。’遂别去。”[3]（《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五，P356－357）曾畹拒绝了周钟等人的唆使，受到江右文人的赞扬。周亮工批评张氏之说见于此信的眉批，周圻之言见于《复江宁刘生黎先然》。[3]（《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十四，P917）三人都认为张氏是受到了江左人士的唆使而攻击艾氏。尤其是曾畹亲历其事，其言可信。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清初的吕留良、范方等。范方说道：“夫既自云卒毁《辨艾书》勿出，而犹刻其略，他日又自文饰曰‘偶驳《定》、《待》，未尝力攻千子，千子疑为中吴指使’，使非庭闻、百安两书明证，则尔公受嗾之迹，其不为千秋不决之疑者几希？”[10]（卷三《天傭子集跋》，P663）也认为曾畹、周圻二人的书信可以明确证明张自烈受到了周钟、张溥的唆使。同时认为吴应箕、万时华、陈弘绪、刘城等是讲和之人，而曾畹、周圻、周亮工等人是因为看不惯江左人士暗地的“以豫章攻豫章”的做法而为艾南英鸣不平。范氏所言大致正确，值得指出的是，吴应箕、刘城虽是讲和，然偏向于张自烈处更多，这与他们同张溥、周钟等人交往密切有关。

我们也可以从张自烈晚年编订文集时的心态来考察他对与艾氏论争的态度。三十一卷本文集中保留了二人论争的部分信息（二十四卷本删去一部分），这是我们在探究二人争论时主要依据的材料。侯方域曾劝其删除著作中驳斥艾氏的部分：“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时殊不草草。足下向驳议其文章，因及其行己骄愎，其在当时固所不免。但骄愎，千子之小疵；大节，士流所难言，今日论定，似宜为贤者隐护也，足下文集中可删此一则否？”[11]（《与张尔公》，P172）张氏部分采纳其建议，在二十六卷本中删去《与艾千子书》，但仍保留有对艾氏不满的言语。吴应箕的弟子刊刻《楼山堂集》时未收涉及艾、张论争的信件，当有其考虑。但张氏将其收入《楼山堂遗文》，用心值得玩味。

有意思的是，张氏不同版本《文集》中的同一篇文章会存在差异。例如《自撰墓志铭》，自定三十一卷本中有“崇祯四年如京师，条例古今选举法万余言，……论古今人文不阿。丙子赴友难，复至京师”，[3]（P326）而康熙二十六年刻本中则是“崇祯四年如京师，条例古今选举法万余言，……论古今人文不阿。金沙周钟者，盗时名，士争景附，烈独廉其伪，致书寓规，与钟绝。丙子赴友难，复至京师。”[7]（卷二）多了关于周钟的一笔。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张自烈撰写《自撰墓志铭》时，提及黄道周信州兵败事，尚属

南明弘光元年十月左右(1645,顺治二年),周钟于弘光元年四月(1645)以从逆论死,张自烈亦因党祸入狱,后趁弘光政权瓦解而逃出,可能当时未及在文中写下此事。后来修改《自撰墓志铭》时已是康熙元年(1661),有可能是鉴于周钟声名狼藉,故他在修改的《自撰墓志铭》中增加了对周钟的一段批判文字,有意显示自己识人的先见之明,刻意撇开自己与周钟的关系。参以魏禧说过张氏的文章有些是多年后补作的事实,①我们推测他试图掩盖自己受周钟等人唆使的事实。但有些无法掩饰,如《四书大全辩》卷首参订姓氏中,周钟之名赫然在目,说明关系非同一般。

晚明时文选刊往往与文社门户、时文出版利益联系在一起,时文编选有时甚至成为党社联络声气、互相标榜的工具。艾南英选文严切,不愿别人攀附豫章文派以扬名。"吾豫章本以清古奇质闻天下,而一辈少年无知者,尽取肥皮厚肉,剿袭饾饤,以为豫章。夫使天下谓豫章派为贤知之过,弟犹甘之,使天下谓豫章派为臭腐败恶,弟有此头可断,此心此口决不敢自诬。"[6](卷三《寄万茂先书》,P220)又说"豫章正派,弟不欲多,多则秽"。[6](卷三《答杨澹云书》,P224)对豫章文派要求严格,他提倡学习欧阳修、曾巩的古文文法来改造时文,实际是在维护江右文学传统,而非将房选作为立宗派、结社党的工具,其态度非常认真,故而会全方位的攻击各种时文弊端。而张自烈选文与江左文人主张接近,注重前后七子传统,文主秦汉,注重用经学改造时文,将时文房选当作结社的工具,差别较大。

张自烈与艾南英之争长期被忽视,它实际上是江左文人"以豫章攻豫章"策略的产物,是艾南英与江左文人论争的继续。我们所熟知的艾南英与陈子龙、夏允彝、周钟、张采等人的论争已经包含有较强的地域文化传统意识。江左文人继承王世贞等人的文学传统,而艾南英继承欧阳修、曾巩等江右文学传统,双方既有古文领域的论争,也有时文领域的论争。由艾氏与江左文人的直接矛盾,到因江左文人离间而出现的艾氏与江右三家的关系破裂,再到艾氏与张自烈的论争,我们可以看到江右文人集团内部的短暂分裂,也可见江左、江右两种地域文学传统在晚明持续而激烈的论争。② 艾、张的论争实际上是秦汉与唐宋两派文学主张在时文领域的体现。艾、张(或者说艾南英与江左文社)关于时文的论争尽管以艾氏的暂时失败而告终,但是艾南英以唐宋古文首尾开阖、抑扬深浅、发止敛散之法论时文,提出义与法、神与气、雅与洁等范畴,③使得时文理论不断完善,经过清初吕留良、方苞等人的提倡而发扬光大。二人论争也使得后人对时文与古文的界限与相通、对时文领域的秦汉与唐宋风格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后来的时文理论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冯小禄. 文社宗派性格——艾南英陈子龙之战再检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
[2] 曾 肖. 文章作法自不同,十年论争缘意气——论明末时文大家艾南英与复社之关系[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4).
[3] 张自烈. 芑山文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4] 吴应箕. 楼山堂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1389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刘 城. 峄桐文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 艾南英. 天傭子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72册)[Z].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7] 张自烈. 芑山文集[M]. 康熙二十六年(1687)俞王爵刻二十四卷本.
[8] 陆世仪. 复社纪略[M]. 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周亮工. 周亮工全集[M]. 朱天曙编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0] 范 方. 默镜居文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3册)[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1] 侯方域. 侯方域集校笺[M]. 王树林校笺.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立荣)

① 魏禧在评点吴肃公作品时提到"然芑山诸书,多有事后作者,未必果致其人也。"详《答张芑山先生驳君死社稷书》附录。吴肃公《街南文集》(卷四),清康熙二十八年吴承励刻本。

② 关于江左与江右之争的演变过程,可参丁国祥《明季江左江右之争的演变》,《学术交流》,2011 年第 9 期。惜未及张自烈与艾南英之争。

③ 三个范畴的论析可参黄保真、蔡钟翔、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清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1 – 37 页。